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

杜 先 菊

内容提要: 梁启超自戊戌变法以后,思想上连贯不断的主线是他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确立的民权思想。他主张采取渐进改良的手段,逐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内取消封建专制主义;通过教育民众、思想启蒙等温和的改良运动,使中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梁是伟大的启蒙学者和政治思想家。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梁启超以“善变”著称。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思潮,他的政治态度和相应的政治方案也时有变化,尤其是戊戌变法以后,时而君主立宪,时而民主共和,时而又是开明专制,加上他在舆论界的广泛影响,他思想上的这些变化给人们留下了“流质多变”的深刻印象。本文拟以梁启超戊戌变法后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找出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通过探讨造成他政治态度与言论“屡变屡迁”的原因,对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爱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有一个粗略的把握。

一、思想主流:戊戌变法时期的“民权”思想

梁启超早期的社会思想直接继承了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而又高出于他们。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已认识到,象洋务派那样光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的技艺是不够的。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变官办为商办或官商合办,提出“商战”的口号;在政治制度上初步提出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但他们仍未摆脱“变器不变道”的思想。

到了戊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才明确提出“器变道亦变”的口号。从那时起资产阶级才真正开始了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改革制度相联系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都被提出来了。民权、自由、平等、宪法、国王、进化、竞争等封建政治理论中闻所未闻的观念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境界大开。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梁启超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以“进化论”与“民权”思想为理论根据,把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演为“三世六别说”,阐明了“君政”与“民权”相嬗的原理,认为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从而提出建立“君权与民权合”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一资产阶级变法纲领,尖锐地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②。他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权”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往后一直在他的理论中占主导地位。“民权”思想是作为和数千年的封建绝对君权的对立观念而提出的,已经达到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高度,这是他大大超过上阶段改良派的地方。

梁启超把参用“民权”看作是当时政治改革的动力,认为“今压力之重,必自专任君权始矣;动力之生,必自参用民权始矣”。呼吁打破人民不能议政、参政的沉闷局面,“首奖

喜多事之豪杰，尽网岩穴勇敢任侠之志士仁人”^③，以促成政治的进步。

但是，梁启超早期的民权思想已经显露出改良主义的端倪，在国家学说上突出地表现为“权生于智”的主张，并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民主主义，而在政治手段上主张改良主义，如“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④，“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等，把普遍的民权推之于十五、二十年之后，而革命是“最险之着而最下之策也”^⑤。

二、“破坏”与“共和”：流亡日本初期的激进言论及与革命派的合作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到辛亥革命胜利后才回国，这段时间是梁启超思想最复杂、变化最显著的时期。以政治态度论，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99—1903年为激进期，1904年—1906年为锐退期，1907—1911年为复苏期，即从一度主张共和革命，倒退到“开明专制”，又恢复到立宪请愿。

流亡日本初期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言论最激烈的阶段。他广泛涉猎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政治言论也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变。

梁启超在海外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办报，除短期及附带的刊物不计外，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清议报》自1898年12月创刊后，梁“高唱自由平等学说，自号饮冰室主人，题其学说曰饮冰室自由书，颇为世人欢迎”^⑥。《清议报》于辛丑年(1901)年冬停刊，第二年正月初一(2月8日)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清议报》后半期和《新民丛报》创办的第一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活动，使梁成为“舆论界的骄子”^⑦。

激进时期梁启超思想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大力提倡民主自由，鼓吹“破坏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由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刺激，加上东渡日本，亲身接触到资本主义世界，见“畴昔未见之籍”，探“畴昔未穷之理”，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开始抛弃“公羊三世”、“托古改制”等外衣，全面接受资产阶级的一整套社会政治、伦理与学术思想，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内容广泛的宣传，为古老的东方帝国输进了西方文明的新鲜血液，“使人们知道了原来除了古圣贤者之外，世界还有那么多精深博雅的思想与道理、原则与方法。”^⑧他那常带感情的生花妙笔，使民主、自由、革命的思想大放异彩。

在1900年四月给康有为的一封万言书中，梁启超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民主自由的理解。他认为，自由民主学说是“开民智”的必由之道。不兴民权，民智即无法开，欲开民智，舍言自由亦无他途，所以他主张“以万钧之力，激励奋迅，冲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⑨。

这阶段他在国家问题上赞同卢梭《民约论》的观点，认为《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良药^⑩。他在《卢梭学案》中阐明国家主权在民的学说，认为“主权之用可分而主权之体不可分”是《民约论》的宗旨。要体现主权在民，首先是“立法权”的执行不能“使人代我”，“必常在全国人民手中，而万无可分之理”^⑪。这里，他把上阶段民权思想发展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高度。

在提倡民主自由的同时，他还以此为武器，对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中国政治不进步，就是因为民主自由不发达。自由以及维护自由的意识和能力都是天赋予人的，不容剥夺。“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

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⑬这种“政术”便是愚民政策。在1902年下半年所写的《拟讨专制政体檄》中,他强烈呼吁:“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⑭他主张“我辈今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朝食”。

“破坏主义”,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手段,这种激烈的革命手段构成此一阶段梁思想激进的最大特征。在《清议报》时代始倡“破坏主义”,到了《新民丛报》时代,他的“破坏主义”的理论较之以前更为充实而壮阔。他除了重新强调破坏主义是应乎时势而无法逃避的潮流之外,还指出破坏主义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挽救国家危亡也是不可缺少的必经阶段。破坏的种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有血的破坏,一种是不流血的破坏。如果不流血的破坏不能救国,则不得不“取有血之破坏之途”,即进行流血的革命。与他1902年12月所写的《释革》一文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破坏”所要达到目的是根本的社会变革(Revolution)而不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Reform)。他认为,中国社会数千年积弊已非局部的改革所能清除,必须从根底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辟之”,否则,一切只不过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者也”。^⑮他认为当时谈论维新的人中,除了少数欲借此谋仕进外,较有见识者也不过想步人后尘拾人牙慧,从西方搬来一些代表现代文明国家的先进制度和设施,最初是外交、练兵、购买机器、制造机器,接着是商务、开矿、铁路,最后也不过是警察和教育,这种亦步亦趋地进行枝枝节节的事仿并不能使中国变成与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并不能使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经历了社会的根本变革、消除了最腐败的一大部分之后,一点一滴的改革才能收到成效。否则,“披绮罗于嫫母,只增其丑;施金鞍于驽骀,只重其负;刻山龙于朽木,只驱其腐;筑高楼建于松壤,只速其倾;未有能济者也。”^⑯

这个时期,梁启超也曾醉心于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但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宣传民主自由的原则、鼓吹彻底的革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于革命之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建立,则并无详细的论述。

这几年也是梁启超反传统思想最激烈的几年。他已经不象以前那样拳拳服膺于康有为的学说,而是对康有为坚持的尊孔保教的主张提出了反驳。他认为提倡尊孔保教的结果,只能束缚国民的思想,“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唯保国而已”。^⑰他勇敢地表示,“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⑱由此,康梁的分歧便公之于世了。

自1899年三月间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后,梁启超不仅在思想上挣脱了康有为的控制,同时,在组织上也成为维新派在日本的首领。康有为在日本时不愿与革命派“乱党”来往,梁启超当时虽然有心与革命派合作,也难以有所作为。康离开日本后,他才与孙中山“时相往还,顿相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浪,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⑲梁声明他多年的办事宗旨是“务求国之独立”,而具体方案则可以随时变通,只要能够救国,便应倾心相助。他屡次约请孙中山当面商谈^⑳,并且一起拟定两党合作进行革命的计划。为了使康有为不从中制肘,孙中山要梁给康发一封规劝他放弃政治活动的信。梁在信中说:“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㉑梁启超进而与兴中会员陈少白商议两党合并的方法,后来推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草拟两党合并的章程。但徐勤、麦孟华是最坚决的保皇党人,他们对梁这

种违背康有为意志的作法大为不满,暗中激烈反对。他们写信给康有为说:“卓如(梁启超字)渐入‘行者’(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②1}康有为得信后大怒,立刻派人携款赴日,促使梁启超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不敢抗颜,决定即日赴檀香山。他从日本起程时,还约孙中山共商国事,依然说他赞成革命,并表示两党一定合作到底。梁启超在檀香山及美洲发展改良派组织——保皇会,筹集款项,同时,思想也在“革命”和“保皇”之间徘徊,并因此受到来自保皇派康有为和革命派的双重指责。后人对这一阶段的梁启超也颇多非议,认为梁启超“是一个极为圆滑、狡诈、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②2}。

不可否认,梁启超此时依旧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革命派的政治思想,并把革命派引为同道,希望能汇合海外所有的爱国者共同完成光复祖国大业。抵檀香山后,他致函孙中山:“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之理。”^{②3}康有为1902年春曾写过两封长信,想以此来纠正梁启超的思想,表明梁这段时间确实脱离了改良派既定的思想轨道和行动路线。只不过由于政治派别阵营的既定存在,梁启超无法脱离其师而孤军奋战,而革命派的主张梁又并未全盘接受。这种两面夹攻的局面是由政治派别不同和梁本人思想上的内在矛盾造成的。我们应当承认:梁启超确实力图使两派力量达成融合,尽管合作最终由于庚子之后的失败而告结束,并且导致了改良派的内部分化和不久以后的大论战,但不应因此断言梁启超个人的合作企图是“政治欺骗”。

梁启超的辉煌著作《新民说》就陆续发表在这一时期。《新民说》除了反对保教、大倡民主自由、破坏主义外,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启蒙工作。他不仅在政治上希望能实行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且还试图把资产阶级的社会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一整套理论都搬来,这种努力贯穿了他的一生。注重理论探讨与思想启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特色。《新民说》便是其中最最有份量的代表作。

梁启超对封建伦理道德、社会风习进行了大量批判,把人们的心灵创伤、道德堕落、愚昧无能的原因都归本于封建专制的政治。这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最深刻的批判,既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缺乏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那种政治能力和伦理道德观念这一历史事实。他的《新民说》“给萎靡颓唐的封建末世吹来了一股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息,使大批知识分子挣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激昂奋发,走上了革命道路”。黄遵宪说,《新民说》发表后,“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摺、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足见影响之巨大,其盛况不下于严复的《天演论》之发表。梁启超的欲维新国家必先维新国民的思想,正是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民族性改造”运动的先声。

梁启超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使得中国人民政治能力极不发达。这种结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是宗法的“家族制度”。中国人只有“族民”(部民)资格而无“市民”(国民)资格,个人只能作为家族的一员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一分子而存在,他可以是孝子贤孙,但无法作为一个政治化公民而积极参预国家政治。因而社会的基本单位看起来虽大,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却很狭窄。他鼓吹要“铸部民为国民”,其实质是要求使人民从封建宗法的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取得人格的独立,从而活跃其政治能力与首创精神,去开创一种建立在新型结构上的国家与一种服从新型秩序的社会。

当代的中国人都懂得了现代化不仅包括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且也包括人本身的现代化。而梁启超则是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懂得将人本身的发展作为政治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他认为,如果国民都成为具备各种条件的“新民”,则理想的政治便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具备一定政治能力和现代化性格(即梁提倡的那些新道德)的国民将享有民权。中国长期的“一人专制”造成了恶劣的民族性格,要改变这种性格,并且在维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使政治民主化,必须首先实行“开明专制”。

梁启超关于中国人只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的论断,导致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改良主义。孙中山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也曾经作过一些分析,他也承认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统治下,中国人民不可能一下子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因而他设计出“约法训政”的革命程序说,主张从革命者在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后对人民进行民主政治训练,使他们具备基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实现民主共和制。梁启超则主张改革现存的封建制度,使之变成资产阶级的制度,在改造政府的同时也改造人民,使他们从封建君主的臣民变为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公民,使皇帝由封建帝国的君主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的一种象征,通过这种温和的手段而达到社会的根本变革,建立一套与从前绝不相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思想意识形态。他反复强调,改造国民思想、造成社会的根本变动比改造政府、夺取政权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建立宪政、形成民选议会的基本社会条件之一,就是要有相当数量的接受了新式教育、具备了近代民主意识的公众;这些“公众”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启迪、引导和培养,即需要有意识地“开民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一直贯穿了梁启超的一生,并在1906年以后发展为梁启超在政治主张上的“开明专制论”。

三、一次重大转变:“开明专制论”与1905年的大论战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由美返日之后,其言论发生重大变化。他不再主张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度。梁刚回国,就有署名“和事人”者在报纸上撰文,说“阅新民丛报三十八、九号,得读大作,知从美国回,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②梁启超在答文中承认他“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今者反对破坏主义”^③。他说:“辛、壬之间(1901—1903年),师友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也,亦不可得。”^④他同年所撰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里之学说》一文中声称,他多年醉心于共和政体,及至读了伯伦知理的理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理由是,中国人民缺乏实行共和制度的资格。因为如伯伦知理所说,“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之性质,适与彼成反比例”^⑤。如果中国一定要实行共和,将会造成动乱的恶果。从历史上看来,共和“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从理论上看来,共和“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⑥。共和将断送中国人民的幸福与自由,所以他虽然爱共和,但更爱祖国,更爱自由,为此而不得不“与共和永别”。

梁启超也不再主张用革命手段建立新制度。他认为中国人有四大缺点,“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心之柔弱”,“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缺”^⑦。因此在他看来,当务之急不是改造政府而是改造国民自身。“故我国勿徒怨政府骂政府而已,今之政府,实皆公等所自造。公等不好造良政府,而好造恶政府,其又谁尤也?”^⑧在中国人只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时,革命的结果只能得专制而不能得民主,而导致一种“民主专制政体”,于是会有一种“非常之豪杰”借军队的力量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以宪法、选举、议会等装点门面。梁后来又称这种政体为“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是“共和专制政体”,“最可厌恶”,“最后之结果必变为君主专制政体”^⑨。如果存在着这种“专制民主”,

则不可能实现立宪君主政体,更不可能实现纯粹的共和政体。^③这样,梁启超的结论是:
“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④

那么,何谓“开明专制”,又如何实行“开明专制”呢?梁启超说:“以所专制之客体(国民)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开明专制的目标是立宪。“开明专制,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立宪之前,开明专制的主要任务是开启民智,训练民众。“开明专制,与教育相倚,政治革命与教育相倚,经此两阶级后,则虽民族主义缘兹普及可也,虽共和资格缘兹养成可也。”“一日不行开明专制,一日不行政治革命,则教育一日不普及,而人民一日不能得其共和之程度。”^⑤

在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的“约法训政”之间,可以找到许多相似之处,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主张由军事扫除障碍,进入约法训政阶段,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最后达到立宪政治。这三个阶段,约法训政承先启后,是重要的一环,如果约法不完备,训政不能普及,则最终的宪政目标即难以达成。即使勉强进入宪政,也难臻于理想。当然,梁的“开明专制”所要达到的立宪是改革现状的立宪,其目标是君主政体,而革命派的目标是民主政体。

梁启超曾经对革命党人的约法训政理论进行过深入的驳诘,从政治上看,显然对革命党的政治宣传和组织活动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对照辛亥革命胜利和失败后的种种政治现象,再回头看看梁启超当年的疑问和非难,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梁当初预言的“十年以后当思我”,并非自夸之词,在两派的大论战中,梁启超的言论中蕴含着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确实抓住了孙中山革命方案中过于理想主义的弱点,虽然他自己并未找到过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法,但从理论上,他不主张盲目套用美国或法国的政治制度设置,主张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予以取舍,对于当时实施政权建设的革命党人,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他所作的理论探讨,在思想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四、立宪政治:论战结束后的政治主张

与革命派论战结束后,梁启超竭力鼓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宪政”,来批判封建的“专制”。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互相角逐中,各自的力量都在增长,革命的声势已大于立宪,成为时代的主流,但在经济、文化领域,立宪派仍有优势。1910年至1911年间,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虽已如火如荼,但立宪思想在知识界及其他领域仍很流行,为许多人所接受。

梁启超在《宪政浅说》中研究了“国体”与“政体”问题。他说只有一个“直接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叫“专制政体”;有两个直接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互相限制,叫“立宪政体”。另外,“虽有行政首长与国会两者并立,而国会毫无权力,徒为行政首长之奴隶,则亦谓之专制”。按他的分法,把国体和政体合在一起,可得四种国家:君主专政、君主宪政、民主专政、民主宪政。他说政论者所争,“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则不可也”^⑥,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决定于“政体”。而且他还认为:“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的轨道恒继之以进化,革命的轨道恒继之以革命”。^⑦这就是他一生在方法上主张改良而不赞成革命的理论根据之一。

那么立宪政治为什么要比专制政治优越呢?他认为其根本精神在于,实行宪政则使国民能通过国会对最高权力的执行常施监督,以收制衡之功。他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虽然也有

一种“君权有限”的精神，如利用迷信的“谴告说”，有“天听自我民听”的理论，还设有“谏官”等职，提倡“文官死谏”的美德，但是，“百僚士庶之箴谏谤议总不能有节制骄主之实力，天道之遽远乃更不足以动其心”^⑧。封建政治还高唱“仁政”，可是“言仁政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⑨，缺乏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圣君贤相千载不一遇，所以治日少而乱日多。他认为政治现象所谓“一治一乱”，是指专制国而言，立宪国则“一治而不能复乱”。^⑩因为在立宪政体下，“宪法”是“使法必行之法”，国会是“监督机关”，不会因某个人而导致动乱。

至于国会的组成，梁主张为使各种政治力量都能有其代表，为防止单一国会造成本国自身的专制，中国也应与世界大多数立宪国家一样采用“两院制”，可称“国会左院”与“国会右院”^⑪。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多元化结构及其制衡精神是有一定的认识的，认为这种结构“富于弹性”，能够“自弥其缺点”，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同时梁还认为立宪国家的政党必须“常在两党以上”。

梁启超回国后直接参与了国内的政治活动，成为立宪派的思想领袖。1905年以后，清政府的假立宪搞得纷纷扬扬，又是颁诏书，又是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着实叫梁启超大大兴奋了一番，使他对清廷产生了新的幻想。戊戌维新时期康梁谭等梦寐以求的不就是朝廷维新吗？现在连最顽固的慈禧之流也“咸与维新”了，也难怪他如释重负地声言“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了^⑫。他还辛辛苦苦地帮五大臣们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不久清政府宣布了有名无实的厘订内阁官制结果，梁启超对这次改革虽也表示不满，但是并未消极，而且进一步主张组织政党，“以督促之，推进之”^⑬。对清政府这次毫无诚意的立宪活动，直到辛亥革命后他才看穿其真面目。1905年，他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说：“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⑭但直到此时，他也仍然向往立宪，认为真正的立宪能够使清王朝起死回生。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胜利时，梁启超及立宪派也是一片共和的呼声，群起组织共和党，革命派也接纳了他们。当革命派以为“破坏告终，建设伊始”的时刻到来，倡议发展实业，以厚民生时，立宪党人对此表现了极大兴趣，积极响应，组织协会，筹建企业。梁启超一派天真，以为又是推行他的立宪方案的好时机，甚至，对于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也寄托了立宪的厚望。但在袁氏帝制自为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拒绝利诱，不怕威胁，冒着生命危险揭起义旗，他在策划和保卫共和制度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立场，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国，这是梁一生中政治上比较精彩的又一段，也是他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

五、思想困境：左右梁启超政治态度的各种因素

1903年，梁启超本人对自己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曾慨叹地说：“吾自美国归来而梦俄罗斯”。他自知过去与他站在同一阵线而赞美共和的人将唾弃他，诅咒他，于是他高喊着：“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倦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也。吾布热诚，以俟君子。”^⑮这次转变是梁启超一生中反反复复的转变中最为显著、最有影响的一次，我们试图通过剖析这一次转变，来讨论左右梁启超政治态度的各种因素。

一、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相互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梁启超的政治行为。当双方试图谋求合作时，梁启超力图在两派之间达成思想和行动上的妥协。他不象康有为那样因为奉清

帝“衣带诏”的缘故而视革命者为乱党，也不象康有为那样高傲，一定要所有的爱国者承认自己是领袖，所以，他对与革命党合作一事表现了十分热忱。但是，两党的合作因为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也因为在香港发展保皇派势力取代原来的兴中会力量，而得不到革命派的谅解。1900年革命派与保皇派关系破裂后，革命派对康梁的攻诋日无宁息，“梁文妖”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在香港的《中国日报》上出现，梁也曾任《新民丛报》上屡登告示辩白，双方的冲突愈来愈烈。加上两派在海外争夺有限的华侨捐款，发展组织，原来改良派深感有“澄清事实”的必要，于是才有同盟会成立后的那场大论战。而一旦发生争论，双方的观点都不免各走极端，这可以说是1903年梁启超言论转变的非主要的但又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这次转变的更深刻的原因仍旧是在思想领域以内。梁启超因为这次转变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他曾在《新民丛报》第四十二、四十三号合本的《饮冰室自由书》中作过辩解：“吾……自认为真理者的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⑧那么，1903年时梁所自认为真理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梁启超1904年间与黄遵宪的书信来往中看出，他已经对民主共和制产生了失望情绪。七月初四日，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之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仆自愧无公之才之识之文笔耳，如有之，以当时政见宣布于人间，亦必如公今日之悔矣”。^⑨梁、黄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遭到了幻灭。梁启超在美国的半年间，对美国政治和华侨的政治素质等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省(州)。又非成于诸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政治。”言外之意，是说中国没有美国建国的条件，所以不能实行共和政治。

三、美国民主政治的现状也叫梁启超大失所望。在政党政治中，两党互相倾轧，官吏贪婪，如市场一般。选择频繁，政治缺乏效率，况且选出的多是庸庸碌碌之人，并非英俊杰出之辈。梁启超在美国看到旧金山华侨社会的紊乱和社会的黑暗，联想到国内公局、公所、协会学社等的不良情形，越发不敢相信共和政治，慨然谓中国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夫自由云，立宪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

对西方民主政治由狂热崇拜到悲观失望，是维新派知识分子所共同走过的心路历程。诚然，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民主自由学说在西方导致了民主制度的充分繁荣，也使自由民主思想深入到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角落。但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本身就陷入了困境，战争和动乱使西方思想家们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怀疑。先生们自己的失望多多少少也感染了他们的学生。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即便这种民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一旦移植到中国来，马上就“淮橘为枳”，只会产生拙劣的变种，在这种极端的失望中，许多人返回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老阵营。严复如是，章太炎亦如是。严复这个率先介绍西学、译述《天演论》的先驱者最后发现只有孔子之书才是“耐久无弊”的法宝，“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译”^⑩，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则对西方盛行的资产阶级代议政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这种政治主张的倒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困境。

黄遵宪的思想对梁启超言论右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梁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报》，自撰长篇寓言《新中国未来记》，其思想由激烈转向

温和的迹象已经隐约可见，而他主张效法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要求朝廷改革，以及放弃革命、破坏的论调，也已和盘托出。^②十一月初八日（12年13日）黄遵宪读了这篇小说，就写信告诉梁说：“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同月又有一封长信给梁，反复说明自由民权、破坏主义、冒险进取、革命、族类分治等学说不适于当前的中国，且召致乱亡之祸。黄遵宪同梁启超同时发现了欧美的民主制度与他们先前所向往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想国的距离，同时，也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将这些理想付诸实践。

四、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使梁启超对自己先前的宣传活动产生了怀疑。他1901至1903年的激进言论，由于他一支常带感情的笔而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破坏之说，喧腾于国中。”留学生和国内学校受革命思想传播的影响，频闹风潮。针对全国知识界普遍的革命情绪，梁启超急急收兵，他的理由是“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脑中。又见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③。到了民国九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他在书中重提此事，所持理由一如往昔：“启超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齏，持论稍变矣”。^④知识分子的现状，革命派内部纷争和一些不成熟的活动也使梁启超大为失望。“递近数月来，惩新党焚乱腐败之状，乃盖不敢复倡革义矣”。“政府固腐败，而民党之腐败亦与相埒焉；政府固脆弱，而民党之脆弱，或犹倍蓰焉。”^⑤

应当说，梁启超的担忧也并非杞人忧天。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希望幻灭后并没有找到现实的斗争方向与方法，除了一部分消沉失望、回到书斋的而外，部分人仅相信少数“英雄”个人的力量，企图以个人恐怖暗杀活动来取得革命胜利。欧洲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时也影响了中国的共产党人。当时革命报刊的宣传中，常常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成份。革命派设立的学校里，甚至有意识地按照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榜样来培养训练青年。梁启超从改良主义的立场来反对这种激进宣传与活动，虽然夸大了其中的消极成分，但他也明智地看到了这些活动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并因此引咎自责，进而放弃“破坏”之说，这一理由应当是比较可信的。自然，革命派的思想及行动也不无幼稚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舍暴力革命无他途，梁启超的主张即便从理论上道出了一些真理，也失去了指导政治斗争的现实意义。因而，他这段时间的政治活动只能从反面提醒革命派注意自己行动中的薄弱环节。梁启超因为反对革命失去了先前“舆论界骄子”一呼百应的号召作用。

六、万变不离其宗：梁启超一生中的“变”与“不变”

以上简要描述了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

我认为，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态度固然千变万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从接受康有为的学说起，他的理想便是改革封建王朝，使之变成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后虽然超越了康的公羊三世说而以卢梭、孟德斯鸠以至伯伦知理、波仑哈克等人的理论为注脚，但这仅仅是脱下了康有为穿在新生的资产阶级身上的孔子的古老外衣，堂而皇之地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老家请出了他们的仙灵。1899年至1903年间的激进，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清廷的顽固保守，梁启超转而接受孙中山革命

派的激进方案,大叫“破坏”、“变革”。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他也反复强调“有血之破坏”是万不得已的,如能为“无血之破坏”则是“我国民之大幸”。1905年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复归于保守,重新鼓吹起改良与立宪,实际上这与他一贯鼓吹的民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时,他发现了并且详细阐述了许多先前并未顾及的问题,并且力图缩短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当时的中国现实的距离,使自己的政治方案既与民主共和的大方向相吻合,又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诚以主观的良恶无定形,而必丽之于客观的适不适以为断也。”^①这便是他忽而民主共和,忽而君主立宪,忽而又开明专制的真实底蕴。在这千变万化的政体形式背后,梁启超真正追求的,仍然是消灭封建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他所鼓吹的“君主立宪”与“专制”已经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君主”与专制,而与封建制度有了本质的区别了。

但是,作为政治人物,梁启超毕竟是被中国历史抛弃了,历史没有选择改良的道路而是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当然并非偶然,因而,梁启超的个人悲剧也并非偶然。

结 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促使这些知识分子走上政治道路的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而他们选择的救国方案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迫切要求,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主角。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记录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求救国真理的艰难的心路历程,其中的曲折和下坡,恰恰反映了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多变和梁启超自身所无可逃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梁启超以及改良派所发起和推动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促进中国社会民主思想的进步,起过巨大的作用。他们的总体方案虽然是不成功的,但是,其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建议,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曾经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1905年论战中梁启超的活动也不应完全否定。《新民说》的主旨和精神,在今天仍未丧失其理论意义。因而,总的说来,梁启超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启蒙学者和政治思想家。

注: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

②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文集》第一集。

③ 《说动》,《饮冰室文集》第一集。

④ 《政统学学理擅言》,《饮冰室文集》第二集。

⑤ 《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第一集。

⑥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3页。

⑦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第217页。

⑧ 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21—438页。

⑨ 梁启超:一九〇〇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转引自一九八三年版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第237页。

⑩ 《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饮冰室文集》第二集。

⑪ 《卢梭学案》,《饮冰室文集》第二集。

⑫ 《中国积弱溯源论》,李兴华、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一版第140页。

⑬ 《梁启超选集》第180页,未刊稿。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梁启超选集》第372页、第242页、第114—115页、第115页、第461页、第462页、464页、第669页、第678页、第319页、第671页。

⑳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卷,第265、177页。

㉑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39页。

㉒⑳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第29页。

㉓ 《年谱》第191页。

(下转第110页)

美,而且诗行还会达到不适当的长度。在我看来,《埃涅阿斯纪》的一种较为成功的英译出自C·戴·路易斯(C.Day Lewis,1952)之手,他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中朗诵自己的译文的。他在每一行里置六个重音,音节不等,从十二个到十七个。他在朗诵时还注意到速度的有规则性,以便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引人入胜。这要比英雄史诗双行体或甚至无韵诗体高明。我本人的译文是散文体,我的目的仅在于向既不能用拉丁文又不能用其他外国文字阅读的学生及一般读者提供一点这部史诗的基本内容而已。

1987年11月12日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演

(王宁译)

(上接第105页)

② 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第73—74页。

②③④ 《答和事人》,《梁启超选集》第417页。

⑦⑧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选集》第394—412页。

⑨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

⑩ 《敬告我国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

⑪ 《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文集》第二集。

⑫ 《宪政浅说》,《饮冰室文集》第二集。

⑬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文集》第二集。

⑭⑮ 《饮冰室文集》第二集,《立宪法议》,《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⑯⑰⑱⑲ 《年谱》第364页、第368页、第366

页、第340页、第328页。

⑳ 《清代学术概论》。

㉑ 《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年谱》第310页。

㉒ 《答和事人》,《梁启超选集》第418页。

㉓ 《新大陆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五册)》,第136页。

㉔ 严复:《与熊纯如书札》,第13函,1917年。

㉕ 《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十九册)》,第14—41页。

㉖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十一册)》,第3页。

㉗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九册)》,第63页。

㉘ 《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15页。